

迷宫中的灯塔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场中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不仅是英国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
也是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女性作家。

胡 英

许静雯 著

杜亚鑫



四川大学出版社

迷宫中的灯塔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场中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

胡 英

许静雯 著

杜亚鑫



四川大学出版社

项目策划：陈蓉
责任编辑：陈蓉
责任校对：黄蕴婷
封面设计：胜翔设计
责任印制：王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宫中的灯塔：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场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 胡英, 许静雯, 杜亚鑫著.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690-2880-5

I. ①迷… II. ①胡… ②许… ③杜… III. ①伍尔夫 (Woolf, Virginia 1882-1941) - 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6120号

书名 迷宫中的灯塔：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场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Migong zhong de Dengta:

Ershi Shiji Shangbanye Yingguo Wenxue Chang zhong de Fujiniya · Wu'erfu

著者	胡英 许静雯 杜亚鑫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90-2880-5
印前制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张	8.75
字数	152千字
版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扫码加入读者圈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6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http://press.scu.edu.cn>



四川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胡 英，1979年生，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许静雯，1985年生，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杜亚鑫，1980年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化批评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现供职于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文学场视野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6)
第一节 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概述	(8)
第二节 身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局外人”——伍尔夫的习性分析	(13)
第三节 精神的光芒——对伍尔夫文本中的“灯塔”意象解读	(19)
第二章 “他律”与“自主”之争——英国权力场中伍尔夫的文学实践	(27)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伍尔夫的政治理念分析	(29)
第二节 话语迷宫中的挣扎——伍尔夫对文化、科技“进步”的反思	(40)
第三章 伍尔夫与英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变革	(51)
第一节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英国文学场	(52)
第二节 伍尔夫的文学批评理论	(66)
第三节 伍尔夫的文学实践	(77)
第四章 商人或是“发现者”? ——英国文学场中的出版商	(90)
第一节 英国图书出版业历史回溯	(92)
第二节 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矛盾统一——先锋派出版社的“双重游戏”	(96)
第三节 独立精神的物质基础——霍加斯出版社	(102)
第五章 无声的参与者——伍尔夫文学创作中的读者意识	(108)
第一节 从听众到读者的漫长历程	(110)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读者群	(115)
第三节	不普通的普通读者——伍尔夫的“作者—读者”观	(120)
结 论	(133)

绪 论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不仅是英国 20 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 也是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女性作家。在继承和发扬英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 伍尔夫充分吸收了当时最新的文化、科技理念和艺术表现手法, 并融入了自己的理解,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 为推动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伍尔夫出身于伦敦的一个书香世家, 父亲莱斯利·斯蒂芬 (Leslie Stephen) 是著名的哲学家、评论家和传记作家, 同时也是《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和《康系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 的编者。斯蒂芬于 1904 年去世之后, 伍尔夫的兄长经常邀请包括作家福斯特 (E. M. Foster)、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 (Lytton Strachey)、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 (Maynard Keynes)、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和画家罗杰·弗雷 (Roger Fry) 在内的剑桥大学的友人们到当时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家中聚会, 形成了名噪一时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Bloomsbury Group)。虽然伍尔夫因为健康原因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 但她自幼便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 成年之后更是受到当时伦敦最为活跃的作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们的影响, 从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学素养。从 1905 年起, 伍尔夫便开始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上发表评论文章, 至 1941 年去世, 伍尔夫创作了为数众多的小说和文学评论作品, 其中长篇小说主要包括《远航》(*The Voyage Out*, 1915)、《夜与日》(*Night and Day*, 1919)、《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 1922)、《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1925)、《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奥兰多》(*Orlando*, 1928)、《海浪》(*The Waves*, 1931)、《年月》(*The Years*, 1937) 和《幕间》(*Between the Acts*, 1941) 等, 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则收集

在《普通读者 I》(*The Common Reader I*) 和《普通读者 II》(*The Common Reader II*) 中, 此外还留存了书信集 6 卷(1975—1980) 和日记 5 卷(1977—1984)。

自 1915 年伍尔夫第一部小说《远航》发表, 至 1941 年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出版, 英国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如福斯特、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艾略特(T. S. Eliot)、利顿·斯特雷奇和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 均对伍尔夫的作品进行过深入的分析, 并作出高度的评价。由此可见, 伍尔夫在当时就已被认为是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 伍尔夫研究开始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热门领域, 中国学界近年来也涌现出大量伍尔夫研究的专著、期刊论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总体而言, 现有研究主要试图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个方面对伍尔夫的作品展开讨论, “意识流小说家”和“女权主义者”成为贴在伍尔夫身上的两大标签。然而, 随着伍尔夫研究的逐渐深入, 开始有评论家意识到这两大标签的局限。国内学者伍厚恺便提出不能单纯地将伍尔夫视为一名意识流小说家, 因为“假如我们仅仅把她当作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家来描述, 恐怕正是在‘堆积’一个‘虚构的弗吉尼亚·伍尔夫’”^①。与此同时, 虽然很多研究者习惯于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来解读伍尔夫的作品, “然而这位公认的女权主义先驱者却拒绝承认自己所持的是‘女权主义’立场, 甚至对‘女权主义’这一称谓十分反感。她本人就勾画过当时女权主义者的漫画像, 我们一不小心也会给她戴上这样一幅‘假面具’”^②。“意识流小说家”和“女权主义者”这两大标签在概括伍尔夫创作特点的同时, 也阻碍了读者进一步加深对她作品的理解。

在国外评论家朱莉娅·布雷格斯(Julia Brigges) 看来, 伍尔夫小说的魅力之所以历久弥新, 不仅仅是因为她在其中运用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 并对女性命运表示出强烈的关注, 还因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旨在探讨人类命运的本质: 当我们独处或与人共处时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意识; 我们是如何在

^① 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 存在的瞬间》,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2 页。

^② 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 存在的瞬间》,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2 页。

时间中生存的；在何等程度上人性是由性属、阶层和历史阶段的偶然性所决定的”^①。与此同时，另一位评论家戴维·布拉德肖（David Bradshaw）也指出：“伍尔夫凸显了阶层、文化、性属和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她创作的所有小说或多或少都在讨论这一问题。”^②虽然层出不穷的文学批评理论为我们解读伍尔夫的作品提供了更多可能的理论框架，然而其中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不是某一种或几种批评理论可以穷尽的。要充分理解伍尔夫作品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我们有必要对伍尔夫所在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她独特的个人经历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就伍尔夫所在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正如《英国 20 世纪文学史》的开篇指出：“20 世纪英国文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付一个变动中的世界？”^③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以及多元并存的文学文化思潮，使得“变动”成为世纪之交英国社会的主旋律。19 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们对理性、秩序和物质文明的期望逐渐被对现代文明的怀疑和批评代替，伍尔夫时代的英国人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危机。而伍尔夫作为一个出生于英国“知识贵族”家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同时有着极为敏感的精神世界的女性作家，对 20 世纪上半叶性属、阶层和国际关系的深刻矛盾有着全面的了解和独特的感悟。因此，要对伍尔夫的创作理念和独创性进行更深入、立体的剖析，需要采用更为综合的研究视角。

很多评论家之所以认为“意识流”和“女性主义”是伍尔夫作品最为鲜明的两大特点，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伍尔夫出身于英国的书香世家，成年后生活富足，常年浸淫在伦敦最顶尖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圈子中，关注的主要是精神世界和个体经验，对外部世界相对而言比较淡漠，因此她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社会中的人类关系和权力斗争时深度和广度均有不足。然而，文学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语言文化的结晶，不可避免地会体现那一时期的权力关系，伍尔夫的文本也不例外。虽然从表面看来，伍尔夫没有过多关注人的社会性，而是侧重于

① Julia Briggs, “The Novels of the 1930s and the Impact of History”, in Sue Roe and Susan Seller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2. 本书中所引用外文文献译文，如无特别注明译者，均为笔者翻译，后不赘注。

② David Bradshaw, “The Socio-Political Vision of the Novel”, in Sue Roe and Susan Seller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92.

③ 王佐良、周珏良：《英国 20 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年，第 1 页。

描写人物内心的经验、感受和情感，然而将伍尔夫的作品置于她所处的 20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学场中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她在小说中对现代社会的混乱与无序以及对现代人在传统与变动之间的苦苦挣扎，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和精确的描述。无论是她的小说、文学评论或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处于变革时期的英国社会对人们的影响，并试图通过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探索寻求真正的真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伍尔夫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她对现实社会中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战争对人们心灵的摧毁的思考，以及无数像她这样的“普通读者”对自由、艺术、和谐的两性关系和社会环境的渴求。因此，只有充分考虑到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将伍尔夫的作品还原到她所在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网络之中，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伍尔夫如何在历史与当下、真实与虚构、物质与精神、外界与内心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并通过对此时、此地、个体经验的表达，展开对历史长河中人类共同命运的反思。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书将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理论为框架，结合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历史文化语境，还原伍尔夫进行文学创作时的英国文学场，从历史文化语境、作者和文本三个层面对伍尔夫及其作品进行分析。

绪论部分将简要地介绍研究的对象及目的，同时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综述，提出中心论点，简述本书的理论框架和主体内容。

第一章将讨论英国文学场的历史与变革。本章首先将介绍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随后以布迪厄提出的文学场理论为框架，结合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伍尔夫的习性以及其文学创作的特点；最后将对伍尔夫的文本进行解读，聚焦于其中“灯塔”这一意象，分析伍尔夫在当时及后世英国文学场中的地位及影响。

第二章将讨论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权力场与文学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章首先将对英国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伍尔夫对英国父权制、英国阶层矛盾以及英国海外殖民的态度；随后讨论当时影响重大的优生学、人类学等学科，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的最新发现被权力话语利用之后，给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民众、英国文学场以及伍尔夫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冲击。

第三章将讨论伍尔夫对英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她对所处时代各文学流派的批判与吸收。本章首先以英国文坛中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现

实”与“情感”之争为背景，解读 20 世纪初期英国现代作家就传统与革新何为英国现代小说之出路展开的讨论；随后分析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影响下，伍尔夫如何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并将其选择运用于作品实践中，以带领英国现代小说走出困境。

第四章将讨论 20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出版业在文学场中所起的作用。本章首先对英国出版业的历史进行回溯；随后结合布迪厄的理论分析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版业的格局；最后将重点讨论由伍尔夫及其丈夫创建和经营的霍加斯出版社对传统出版理念的颠覆和对英国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

第五章将讨论英国读者群的演变。本章首先分析 12 世纪至 20 世纪英国读者群在范围、社会阶层上的变化，该变化在 20 世纪初期令伍尔夫及其他现代作家不得不在大众读者与小众读者之间进行抉择；随后以伍尔夫的随笔以及文学作品为例，重点说明伍尔夫认为作者与读者之间应当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模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体现了其“民主”的政治主张。

第一章 文学场视野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虽然英国只是偏居欧洲大陆一隅的岛国，但是由于受到罗马入侵和基督教传播、日耳曼民族大迁移、诺曼征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英国在文学文化传统上始终与欧洲大陆国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1世纪诺曼征服之后，随着安茹帝国（Angevin Empire）的建立，欧洲大陆的文学文化传统在法国王室和贵族的带领下进入了英国，深刻地影响了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至14世纪，随着英国国力的逐渐增强，英语地位不断上升，并通过与欧洲语言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成了更为成熟的民族语言。在这一时期，被后世誉为“英国文学之父”的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开始使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进一步使得英语成为能够与法语、意大利语媲美的文学语言，为今后若干世纪中在世界文坛中大放异彩的英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00年至1660年是英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相继即位，英国海上军事力量迅速发展，并于1588年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随着英国国力的向外扩张，英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不断增强。与此同时，自14世纪以来已经初具规模的商品货币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科技水平的进步，使得英国资本积累的过程进一步加速。在这一百多年中，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英国文学不断发展和成熟，尤其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以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等人为代表的文学巨匠。他们采用新格律创作诗歌，白体诗创作戏剧，并尝试各体新散文，不仅继承了人文主义古典文学的精髓，还表现出英国特有的清教主义的色彩，谱写了英国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篇章。

1642年的英国内战、1660年的王政复辟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激烈的宫廷内斗之后是众多中小资产者对绝对王权的反抗，光荣革命的成功标志着资产阶级议会反对绝对王权的胜利。君主立

宪制的建立不仅为资本主义经济在英国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还让英国免受法国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动荡之害。资本主义经济在英国的发展不仅得到了政权的保障，还获得了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的支持。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英国跻身于当时世界的强国之列，为今后的殖民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深受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18世纪的英国文学以理性和务实著称，反对王权和宗教专制的启蒙运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等人的戏剧、诗歌和散文对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英国小说开始兴起，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托比亚斯·乔治·斯莫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奥利弗·哥尔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等小说家的作品受到了英国市民阶层的欢迎，标志着中世纪以来的“恩主制”的衰败和新的读者群和图书市场的崛起。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场域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文坛兴起的伤感主义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逐渐形成对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有着重大影响的浪漫主义，涌现了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约翰·济慈（John Keats）等众多浪漫主义诗人，以及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简·奥斯丁（Jane Austen）、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等浪漫主义小说家。他们作品中充沛的情感、瑰丽的想象和离奇的情节貌似脱离了现实生活，但实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阶段的英国作家们对自18世纪起便占据英国社会生活中心位置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反思。自1837至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浪漫主义作家们所批判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凸显，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而这一时期也成为英国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以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为代表的小说家们不再延续浪漫主义的文风，而改以现实主

义手法揭示英国社会两性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自 18 世纪起便开始活跃的女性作家对英国文学和英国现实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公众图书馆等便民阅读设施的建立有效地扩大了英国的读者群，使得以小说家为代表的英国作家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英国作家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唤醒了民众的意识，他们虚构的文学作品推动了现实社会中的变革。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英国文学和政治、经济等场域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共振。

通过对英国文学形成与发展历程的简要回溯，我们不难发现英国文学从来就不是孤立于历史文化语境之外的世外桃源，而是与其所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场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实现伍尔夫及其作品更为深入和立体的分析，本章将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文学场理论为框架，结合伍尔夫进行文学创作的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当时的英国文学场，伍尔夫的习性，以及时代、作家、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讨论。本章首先将介绍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并对本书的理论框架进行梳理；随后讨论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场中的伍尔夫；最后分析伍尔夫在其文本中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文学创作的反思。

第一节 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概述

皮埃尔·布迪厄与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德国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被认为是当今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布迪厄吸收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这三位经典理论家的思想精髓，同时综合了人类学、教育学、语言学、哲学和文化研究等不同学科的内容，建构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系统，希望通过对社会生活中实践奥秘的探讨，超越以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二元对立。

场域理论被公认为布迪厄社会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布迪厄认为场域是随着社会的结构与功能高度分化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当代社会可以被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形态各异的空间，这些空间即“场域”。社会科学研究不应该将单纯的个体或是理想化的抽象社会作为其研究对象，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场域以及由不同场域构成的“场域综合性结构”更具有研究的价值。

每一个场域都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它们是力量关系的场所，具有各自不

同的行为法则和权力结构，内部都充满了权力斗争。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场域的边界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场域对其中的行动者有着不同的要求和限制，但行动者可主动选择行动策略，以争夺和维护有利于自己的位置，行动者之间的斗争是场域的动力所在。就“场域综合性结构”而言，虽然不同的场域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具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规则和常规，但是在组成“场域综合性结构”的众多场域之中，权力场是元场域，对其他场域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权力资本则是元资本，左右着其他场域中资本的兑换方式和比率。

文学场是布迪厄研究过的众多场域之一，为了说明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布迪厄利用了“场域”“习性”“资本”这三个核心概念。布迪厄所定义的“习性”不是纯粹的主观性，而是与客观结构即场域相联系的主体性。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文化传统和所接受的教育，并潜移默化地形成和影响个体的社会实践，“谈论习性就是宣称个体、个人、主体都是社会的、集体的”^①。由此可见，个体的习性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②。布迪厄从实践意义的高度提出的习性概念具有能动性和自我反思的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以往社会科学研究中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

除了对习性进行定义，布迪厄还创新性地提出了“资本”这一概念。布迪厄从隐喻的意义上将“资本”概念从马克思资本观的物质化状态延伸到了文化符号领域，不仅包括经济资本，还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只是与经济资本具有某种相似性。其中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可以制度化为学位或教育资格形式；社会资本以社会声誉、头衔为符号，可以制度化为社会规约形式；符号资本与物质性资本相对应，主要表现为语言文字和衣着行为等，是布迪厄理论系统中最复杂的概念之一。在这四类资本中，经济资本是根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其他类型的资本，文化、社会和符号资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转化为经济资本，但布迪厄反对将文化、社会和符号资本简单地还原为经济

^① 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3页。

^②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

资本。

根据对场域、习性和资本的定义，布迪厄以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所在的法国文学场为例对文学艺术场域进行了分析。与其他评论家不同，布迪厄将福楼拜视作一名社会学家，认为只有对福楼拜所在的法国文学场加以分析，才能真正了解作品的生成公式和作家的写作，因为“福楼拜的计划就是在文学场中形成的，生成公式是作品的根源，多亏了写作，福楼拜才能利用这个生成公式，并在同一运动中，将这个生成结构和产生它的社会结构客观化”^①。

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一书中，布迪厄对福楼拜所著的《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进行了解读。布迪厄不赞成将文学艺术经验视为非理性的、不可言说的神秘体验，他希望恢复文学作品历史语境和文本间的有机联系，还原文学作品生成时的文学场，建构一系列“纸上的建筑群”。因此，布迪厄在解读《情感教育》时，不仅对书中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罗在这一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中的生活以及他在艺术、政治与商业之间进行的挣扎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还将小说文本中的斗争与作者福楼拜的人生经历结合起来进行了审视。在这一过程中，布迪厄没有将作品中的人物完全等同于作家，也没有将作品完全等同于现实社会，同时还避免将作品视作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布迪厄希望建构一个完整的文本的生成空间，从作品的产生到意义的生成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找出文学的生成机制。在完成对《情感教育》的讨论过后，布迪厄揭示了这本小说与其作者福楼拜的文学创作行为之间的联系：

《情感教育》的阅读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不止是力求让读者准备进入对社会世界的社会学分析。这种阅读在社会世界中产生，并且揭示了社会世界。这种阅读迫使询问特殊的社会条件，这些特殊的社会条件既是福楼拜特有的洞察力的根源，也是这种洞察力的局限性的根源。^②

在具体分析文学艺术场域时，布迪厄认为应考虑到三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环

① 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② 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页。

节。首先，应该分析文学艺术生产场与权力场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文学艺术生产的行动者和他们所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再者，还需要分析行动者的习性。权力场作为影响着其他场域的元场域，对文学场和其中的行动者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实践和表现（比如他们对‘民众’和‘资产者’的模棱两可）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文学（等）场本身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了一个被统治位置”^①。在权力场的影响下，文学艺术场域中以艺术家和批评家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生产者，以及以艺术收藏家和中间人为代表的在不同程度上依靠文学艺术产品谋生的人，都希望将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作为文学艺术场域中的支配性原则，从而获得在场域中的主导权。

尽管不同时期的文学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权力场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场中的行动者不能对权力场的支配原则进行抵抗。在分析福楼拜时期的法国文学场时，布迪厄认为文学场内部由于行动者的习性和利益不同而充满斗争，这就为福楼拜这样的知识分子抵抗权力场的干预提供了可能性。在分析福楼拜符号劳动的独创性时，布迪厄总结道：“构成福楼拜的独创性的东西，赋予其作品不可比拟价值的东西，就是他至少在否定的意义上与整个文学空间建立了关系，他处于这个文学空间中，把这个空间的冲突、困难和问题全部承担起来。”^② 在福楼拜从事文学创作的19世纪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取代封建社会，“金钱的统治无处不在，技术变革和国家为新的统治者和工业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时是容易投机的利益……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新贵中的一大部分是商人，经济世界逐步占领了报业，报纸读者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利可图”^③。法国文学场也因此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文学场逐渐摆脱了封建社会中王公贵族的影响，但又开始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束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作家选择依附权贵以取得名利，另一部分出身贫寒的作家则通过创作低俗读物以获取金钱，以福楼拜为的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的作家则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希望能够捍卫文学创作的纯粹性。在

^① 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92页。

^② 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54~55页。

^③ 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5页。